



学者应有君子风范

□ 王利明

晰为人处世的道理，“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个道理。既然如此，社会公众对学者也有合理的期待和效仿之心，学者因此有了引领社会风气的表率作用。“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对此，学者负有重要使命。既然如此，学者就应该以君子之风引导社会。反之，如果学者不修身养德，道德沦丧，不持君子之道，给社会带来的消极作用就会成倍放大。

再次，学者的本职是治学做研究，而保持君子风范，对治学影响尤其重要。“文如其人”，欲做好学问，应先做好人，必须严谨规范，切不可急功近利、蝇营狗苟。只有养成良好的君子之风，才能坚守学术信仰和理念，不被世俗左右，真正做好学问，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君子风范不仅要成为当代学者的内在精神，更应当被诉诸言行。学者不是头衔、名号和光环，而是一种担当、责任和使命。要真正做一个好学者，没有君子风范，没有适宜的言行，是不可能的。在孔子看来，君子不仅要有成功的志向，而且要有高尚的道德，内外兼修，“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他自己就是这方面的榜样。一个真正的君子应当达到“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的境界。君子要三省吾身，反求诸己，遇事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这些蕴含着君子之风的古语传承至今，依旧具有教化 and 警醒的功能。学者只有自己先成为君子，才能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践行“修己以安百姓”的求仁之道。

学者作为文化的延续者和守护者，尤其是大学教授，身处学术的重要殿堂，承担传道授业解惑、培育青年的使命，身负传承知识、传播文化的重要，其言行不论对学生，还是对社会，都有超出常人的影响。正是因为学者具有这样的社会地位，学者更应当以正确言行彰显君子风范。

所谓君子风范就是恪守君子之道，这也是儒家学说的核心思想。君子之道最初是为学之道，包含了读书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并可以推己及人，后来君子之道逐渐发展成了为人之道，君子之道对于今天的学者同样重要。

首先，学者的天职是传道授业解惑，承担着教育年轻一代的使命。现今我们的高等教育越来越普及，在此情形下，高等学府的教师更应该具有为人师表的自觉，更应该秉持君子风范，要在言行上成为年轻学子的表率，用恰当的言行举止为年轻学子树立榜样，以此来引导他们在未来健康发展。不仅如此，大学学子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处于关键的成形时期，作为他们的引路人和学习对象，高等学府的教师还应当有意识地培养年轻人积极向上的精神，使他们将来能更好地融入社会，为社会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其次，学者的使命是追求知识、传播文化、传承文明，并起到引领社会风气的表率作用。“读圣贤书，所学何事？”文天祥这句深刻的诘问至今也不过时。学者就是职业读书人，读书的目的固然在于追求知识，但知识如同汪洋大海，学者穷尽一生所能获取的知识只能是沧海一粟，重要的是，学者要善于从读书中思考，能明

晰为人处世的道理，“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个道理。既然如此，社会公众对学者也有合理的期待和效仿之心，学者因此有了引领社会风气的表率作用。“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对此，学者负有重要使命。既然如此，学者就应该以君子之风引导社会。反之，如果学者不修身养德，道德沦丧，不持君子之道，给社会带来的消极作用就会成倍放大。

再次，学者的本职是治学做研究，而保持君子风范，对治学影响尤其重要。“文如其人”，欲做好学问，应先做好人，必须严谨规范，切不可急功近利、蝇营狗苟。只有养成良好的君子之风，才能坚守学术信仰和理念，不被世俗左右，真正做好学问，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君子风范不仅要成为当代学者的内在精神，更应当被诉诸言行。学者不是头衔、名号和光环，而是一种担当、责任和使命。要真正做一个好学者，没有君子风范，没有适宜的言行，是不可能的。在孔子看来，君子不仅要有成功的志向，而且要有高尚的道德，内外兼修，“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他自己就是这方面的榜样。一个真正的君子应当达到“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的境界。君子要三省吾身，反求诸己，遇事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这些蕴含着君子之风的古语传承至今，依旧具有教化 and 警醒的功能。学者只有自己先成为君子，才能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践行“修己以安百姓”的求仁之道。

君子风范意味着要有包容精神，不能不容他人讨论、商榷。包容是一种美好的品德，对学者尤其如此。“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不宜僵化机械地评价知识水平的高低，应当允许多样化的观点存在。学者应当有宽阔胸襟，才能广纳百川，视野开阔，接纳并包容各种不同的声音，保持心态平和，看问题才能客观，也才能够与别人平等对话。平和就是不走极端。“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学者常常被称为专家，其言论对公众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学者要时刻警醒自己，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夸夸其谈、信口开河。多听少别人的意见，才能真正验证自己的观点是否具有合理性。

君子风范意味着要坚守自己的操守和理想。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治学乃纯粹的学问之道，学者治学应秉持敬重公器之心，抛弃私利和私欲，只有这样，学术研究才没有人为的禁区，学术探讨也才能成为追求真理的问学行为。学者不能追逐名利，不能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否则会败坏声誉。“君子如玉亦如铁”，铮铮如铁就是说要始终坚守底线。坚守操守和理想，意味着凡事不人云亦云，不媚俗，坚持实事求是。

学术繁荣有赖于良好的学术环境，而良好的学术环境离不开每个学者个体的努力。只要每个学者追求并秉持君子之道，以君子风范待人接物治学，学术环境就会风清气正，学术研究也才会枝繁叶茂。

岑山书院：从传统文化到革命精神

□ 薛体伟

清代正式定名的岑山书院坐落在山西省静乐县城东北的岑山上，因其地处岑山，故名“岑山书院”。岑山书院是静乐县学教育的发端，是历代名师高徒云集之所，更是英才辈出的摇篮，明代的王希曾、石文绣，清代的李鑫宣、李锡书等都曾就读于此，革命先驱高君宇也曾在这里求学。静乐人杰地灵，素以文明礼仪之乡著称，岑山书院功不可没。

书院学子积极参加“同盟会”

岑山书院创建于北宋大观年间，当时称义学或察院。明洪武二年（1369年）由儒林街迁建于现址，历代均有修缮。义学为庙学，后称县学，清乾隆六年（1741年）改为书院。书院内有明伦堂及存心、养心二斋等，“明伦”是明人伦，所谓“人伦”就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故叫明伦堂。明伦堂是讲学的地方，讲学的内容主要是孔子学说。与岑山书院毗连的文庙是祭拜孔子的地方，文庙坐北朝南，为两进院落，大成殿为文庙的主体建筑，文庙大成殿与明伦堂同处一条直线。文庙与书院既相对独立又浑然一体，“左庙右学”成为岑山书院的建筑特点。因在宝峰寺旧址修建，又处在山腰石坡上，所以岑山书院就习惯地被称为“寺坡”，“寺坡”也就成为书院、文庙和县学的代称。

清代是岑山书院人才辈出的时期，这段时期，岑山书院考取进士、举人、贡士等有两百余人。这些岑山学子中，有的走出书院，千里居官，其学识、品行、政绩被后人称颂，有的办学讲经，培养后代，造福桑梓。清朝末年，朝廷腐败，岑山书院学子同全国人民一样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他们很快接受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这一时期，书院学子中有不少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为推翻清政府的统治作出了很大贡献。

鸦片战争以后，在“废科举，兴学堂”的强烈呼声下，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颁发兴学诏书，令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相应各州县均改设小



岑山书院外高君宇的雕像

学堂。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岑山书院改为静乐高等小学堂，成为静乐最早的官办学校。岑山书院自创办以来，经历了学堂、高小、完小、师范、中学等不同形式的演变，校址所在的岑山寺坡，始终是静乐县最高学府的所在地。

高君宇等革命英杰从这里走出来

岑山书院既是静乐教育史的缩影，也是静乐革命斗争史的见证。由岑山书院演变而来的学校，其办学思想逐步向现代教育转变，成为锻造仁人志士的熔炉，涌现出了许多革命英杰。他们在上世纪20年代投笔从戎，为国家和民族的解放，在战火硝烟中奔走，甚至付出了生命。这些英杰有在第一、二次反“围剿”中屡建战功，号称“猛张飞”的郭炳，有子孙三代27人投身革命的邢洞物，还有留诗“监狱是我家，镣铐作玩要；抛我头颅血，浇灌革命花”的吕调元等。其中，山西省共产主义启蒙运动先驱、山西党团组织的创始人高君宇影响巨大。

1909年，高君宇进入岑山书院改办的高等小学堂读书。此时的学堂在“中学为

体，西学为用”的办学思想指导下，加入了自然科学知识。高君宇在学堂读书期间，汲取着新知识的甘露，并经常和同学们谈论民间的疾苦，他时常吟诵当地古人的诗篇：“万峰西走郁纵横，汾潞分流试火耕。一径寒烟同古戍，几株衰柳带孤城。斗杓月倚栏杆出，壁玺云扶睥睨行。井里久承凋敝后，临风无策起苍生。”此时高君宇的心中已经萌生了拯救劳苦大众的强烈愿望。为了汲取新知识，高君宇在课业之余，经常出入书肆，购买新的书刊。他还搜集诗词、楹联、碑文等，从中获得了不少有益的知识。回到学堂里，高君宇总要将他所知道的事情讲给同学听。1912年，满怀求学深造热情的高君宇离开学堂，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开启了探索救国真理的道路，直至1925年3月因病在北京病逝。高君宇用29年的短暂人生，真正践行了“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的革命誓言，谱写了一曲灿烂的人生篇章。

岑山书院还曾作过贺龙、关向应等的驻地，1937年至1938年，贺龙、关向应等在寺坡上与地方领导和各界人士共商抗日大计，并多次作过抗日形势动员报告。书院还是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的校址。

黄石：含金之石

□ 袁志坚

河。黄石，地下有丰富宝藏，江上是黄金航道，真乃得天独厚的宝地。

有了铁矿，有了铁厂，有了煤矿，有了运送煤铁的铁路和工矿码头，才有了水泥厂、制砖厂、发电厂，有了轮船、汽车、电报、电话、银行，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铁山、下陆、石灰窑、黄石港便连成一带，黄石初步形成了近代城市的雏形。1950年8月21日，经过政务院批准，成立黄石市，黄石成为武汉之后湖北省第二个省辖市。

新中国成立后，黄石在国家原材料工业和重工业发展布局中具有显著的发展地位。1953年2月19日，毛泽东从武汉出发，乘坐“长江号”舰艇视察长江中下游，第一站就直奔大冶钢厂。1958年9月15日，参加武汉钢铁厂第一炉铁水出炉庆典后的第3天，毛泽东临时提出要到黄石看一看，他看完大冶铁矿，再次来到大冶钢厂，称赞钢厂“发展很快”。大冶铁矿至今仍在生产，是新中国名副其实的“工业粮仓”。大冶钢厂如今改制为中信泰富特钢集团，为我国的航天航空、核电、高铁、汽车、船舶、油气、工程机械等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支持与保障，从新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神舟”上天、“嫦娥”奔月，再到“天宫”“北斗”升空，大国重器的关键部位都用上了这里生产的特殊钢。

矿产资源是不可再生的。2009年，黄石被国家发改委列为资源枯竭型城市。资源枯竭，城市不能衰落。为了破解困境，

黄石积极探索转型升级的出路。让人感到欣慰的是，黄石没有丢掉矿业文化的根与魂，而是想办法挖掘老工业城市的文化特质，亮出了新举措，形成了新风景。

黄石国家矿山公园的核心景区“矿冶大峡谷”，就是大冶铁矿曾经的东露天采场。从开办至2000年，这里采出了1.3亿多吨铁矿，生产出32万多吨矿山铜。站在高处俯瞰，这个“亚洲第一天坑”形成了巨大的深谷和陡峭的边坡，最大落差达444米，坑口截面达到108万平方米。家乡人民开展生态治理，在硬岩之上建成了亚洲最大的复垦基地，一到春末夏初，刺槐就会开花。黄石国家矿山公园的另一处景区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将黄石的矿冶文化历史提前到4000年之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冶有色金属公司在建设铜绿山矿的过程中，不断发现古代采矿和冶炼的遗迹、遗物。1973年，湖北省博物馆考古队在铜绿山启动了第一次考古发掘。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发表题为《铜绿山古铜矿的发掘》的演讲，世界冶金史专家、考古学家看到中国从商周时代留下的成熟的地下采矿系统和冶炼遗存时，无不为中国先民的智慧而赞叹。在铜绿山古铜矿遗址，那些至今尚未倒塌的竖井、盲井和水平巷道，默默见证着历史的沧桑巨变。

矿产是战略性资源，自古皆如此。《诗经》记载了商王武丁“奋发荆楚”之事，武丁之妻妇好墓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即为俘获南金之证。《左传·僖公十八年》

记载：“郑伯始朝于楚，楚子赐之金，既而悔之，与之盟曰：‘无以铸兵’。故以铸三钟。”楚文化研究专家张正明认为，楚国的崛起离不开先进的青铜冶炼技术和生铁冶炼技术。在古代矿冶文化自豪的同时，不应忘记屈辱的历史。汉冶萍公司当年引进日本资金，处处受制于日本，大量铁矿石被运往日本。而在日本侵华期间，从1938年至1945年，日本日铁大冶矿业所在铁山更是进行掠夺式开采，劫走500多万吨铁矿石。

矿产可以枯竭，但是矿冶文化不能枯竭，矿冶文化给予黄石人深刻的启示：奋发图强是不灭的进步力量。今天，在大冶铁矿博物馆，在华新水泥厂旧址，在黄石市博物馆，在黄石国家矿山公园，在黄石矿博园，人们不仅看到了工业旅游给经济转型带来的新活力，而且看到了与时俱进给城市品格带来的新气象。读城，读史；敬往，思来。开山掘矿的创业精神、维新求变的创造精神、不惧艰难的奋进精神、浴火重生的超越精神，已经熔铸于黄石人的基因里。

